

王军

抗战初期孙科赴法求援经过

史事纵览

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急需得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除通过正规的外交途径努力外,蒋介石还派出一批由政府要人、国民党元老等担任的特使,游说列国,争取援助。立法院院长孙科率高级代表团两度访苏就是蒋介石抗战初期开展高层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史学界已有较多论述。而孙科在访苏过程中,数度赴法开展抗战外交活动,在发展中法关系,争取法国外交、物资援助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史学界却较少论及。现根据掌握的资料,对此作一介绍。

1938年1月,孙科从重庆出发绕道欧洲赴苏访问,途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这里,孙科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蒋介石派到法国的特使李石曾等在一起交换了国内外有关军事、财政等诸方面的情况。孙科向顾、李介绍了国内的军事形势,认为中国军队存在着严重的组织问题和协调问题,也缺乏调遣运用庞大军队的经验。孙科还重点谈了他出使莫斯科的情况,称此次赴苏首先是要使苏联明白,中国无意将苏撇在一边自己与日本进行和谈。为使苏联确信这一点,孙科将向莫斯科建议建立攻守同盟,并协力促成与英美法三国间的合作。孙科对苏联寄予很大希望,认为中国可以从那里取得最大援助和支持。顾大使也向孙科介绍了欧洲局势,法国对中日冲突的政策,以及顾在巴黎与各有关方面会谈的全面情况。由于当时法国内阁出现危机,濒于解体,法对华政策是否会有变化,只能耐心等待。同时法国面临德国纳粹威胁,正积极备战,自顾不暇,虽同情我国,但

爱莫能助,顾对前景表示了担忧。孙科从介绍中对法国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从当时形势看,德意两国因与日本结盟,公开采取疏华亲日政策,要求撤退在华顾问,所以中国政府已开始修正外交方针,希望加强同英美法苏四国的关系,但英美当时与日本尚有往来,且心存观望,所以在争取援助方面,孙科认为苏法当为争取的重点。

孙科第一次赴苏,会晤了斯大林等高层领导人,发展了两国的友谊,取得了第一批援助,完成使命之后,3月初来到巴黎。为了能与法国高层人士会晤,以从中了解法国政府对中国抗战所持立场及相机请求法国给予援助,顾大使为孙科安排了欢迎宴会及一系列访问活动。

在顾的陪同下,孙科首先对法总统勒布伦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勒氏等法国领导人对苏的外交政策和苏维埃制度都抱怀疑态度。孙科谈了他对苏联的良好印象,认为苏联是在经济和工业复兴中充满新精神的新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

随后,在顾为孙科举行的宴会上,孙科又先后见到国民会议长、内阁总理等一些要人以及一些国家的驻法使节,在一起交谈了欧洲局势的发展变化。但就在此时,法国内阁又一次出现危机。孙科在顾的陪同下还会见了法新内阁的殖民部长莫泰,孙科向其表示赞赏和感谢,感谢莫泰在上届政府殖民部长任内为中国抗战事业提供的帮助。

孙科第一次访法由于很快接到中国驻苏军事代表杨杰的电

报,催其速回莫斯科与苏方商订第二笔贷款事宜而提前结束。此次访法,一方面通过与法方政界人士的广泛接触,对欧洲局势及法国对中日之战的态度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证实了顾的担忧,在欧洲局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法国主要关心的是欧洲的局势,在此条件下谋求法国援助是有一定困难的,而法国政局的不稳定,内阁濒现危机,对华政策也表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孙科也很难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1938年6月初,孙科完成了在莫斯科的使命,第二次从苏联来到法国。此时法国政局在经历了又一次危机之后已开始稳定。鉴于上次与法国政界人士的接触大多属一般外交应酬,流于形式,无法作深入交谈,孙科希望此次能打破惯例,与政界核心人物直接接触。因为拜访政界要人须由大使馆循例照会法国外交部,由礼宾司代为安排,而法外交部向来很保守,且在对中国问题上与殖民部素有矛盾,而礼宾司向以圆滑著称,门面话说的好听,不办事,公文旅行,拖延时日。驻法其他一些国家大使馆往往不通过外交部,直接与国会及内阁首长联系,有例可援。为此,孙科决定避开顾维钧和大使馆,通过中国驻巴黎总领事黄正帮忙安排与法实际负责人谈问题。孙科认为中国正值非常时期,外交上应争取主动,寻求突破,要避免繁文缛节、外交辞令,因为“中国抗战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外援,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勇气”。

黄领事为孙科安排拜访的主

要对象是法国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达拉第。达氏在1933年和1934年两次出任内阁总理,1938年4月,正值希特勒称霸欧洲,法国军事、外交吃紧之际,达氏第三次组阁并自兼国防部长。他对中国一向十分同情。对与达拉第的见面,孙科非常重视,拜访之前,亲自拟定谈话要点,希望与法总理的会谈能有较大收效。在黄领事的安排下,孙科很快与达氏见面。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简单寒暄后,孙科请黄领事用法文向达氏表示:法国在国际联盟上仗义执言,支持中国,1937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九国会议上促使通过谴责日本宣言,中国政府及人民对法国真挚的友情极为珍视,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支援。随后,黄领事代孙科宣读了谈话要点,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希望出售剩余军火给中国。法国武器精良,如能将剩余军火售给中国,可增加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二)希望派遣军事顾问来华。法国陆军的威望在全世界,特别是在远东非常高。中国原聘有德国军事顾问,由于中日战争,最近德国已决定召回,因此中国希望从法国聘请军事顾问,这对中国军队的训练、作战必多助益。(三)希望法国能批准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今越南)进入中国境内。中国与越南毗邻,唇齿相依,为抵抗日本侵略,两国密切合作实有必要,海防至河内,河内至昆明,铁路运输极为便利。如准中国战略物资出海防运至中国境内,使中国战略物资充裕,有助于长期抗战。

黄领事宣读时,达氏用心倾听,且频频点头。待宣读完毕,达氏回答说,他对中日战争深为关

切,几乎每天都在注视它的发展,中国抗战的英勇事迹,时有所闻。在战争初起时,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不能长久坚持,很快就会屈服,但他们错了,日复一日,中国已经抵抗住日本,而且由于这种长期抵抗,显然已使中国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国家,“友邦如此,值得支援”。关于孙科提出的三个要求,达氏一一作了回答:对于军事物资援助问题,如在平时,军火供应不成问题,但目前法德战争迫在眉睫,法国正在重整军备,军火虽加紧生产,仍感不足,因此没有多余部分可以供给中国。关于军事技术援助问题,达氏称他本人持赞同态度,但因法日尚有邦交,派遣军事顾问,可由退役军官以私人受聘方式前往中国服务,同时为了避免外界指责法国公开介入中日冲突,他建议邀请英、比也参加这一派遣军事顾问的计划,使这项行动具有国际性质。至于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运至中国境内,达氏认为原则可行,但必须严守秘密,以免日本轰炸铁路。因为法国也顾虑日本将向安南侵略,在此问题上,中法利害一致。这一问题,殖民部长孟戴尔主管安南事务,可与其商谈细节,军事顾问一事也交他承办。达氏并表示他随后就与孟氏联系。与达氏会晤,求援三案,两案已获达氏承诺。孙科回寓所后即电蒋介石作了汇报,蒋很快回电,同意与法方就此两案进行交涉。

很快,孙科就在孟戴尔的约请下与其在殖民部会晤,二人见面后彼此坦诚,毫无拘束。关于孙科提出聘请军事顾问一事,孟氏称他愿意出力,一定选些优秀军官应聘。孟氏提出了军事顾问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华工赴法

王家鼎

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曾经对同盟国中为首的德国宣战。按参战的先后顺序,对同盟国德意志、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作战的有俄、法、比利时、意大利、美、中等24国。然而,当中国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宣战时,欧战正酣,中国并没有派一兵一卒、

一枪一械去欧洲参战,而是以民间的名义派出了14万华工远赴法国战场支援英、法联军对德作战,从而在战后使中国得以进入战胜国之列,在近代中国屈辱的外交史上争得了些许荣誉和光彩。

可是,当年华工参战的一页历史,今天已逐渐为世人所淡忘。据数年前来自法国的一则新闻电讯指

的雇佣条件,建议由他选派一名适宜的法国将军担任顾问团团团长,应聘军官如为现役,为方便起见,可办理假退役。经考虑后,孙科认为孟氏提出的有关顾问团的薪金、待遇等雇用条件完全可以接受,后这些条件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至于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的方案,莫氏认为为求保密,可由中国军方代表签字先订一密约,这样可以不经外交途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与孟氏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孙科的第二次法国之行因需要再次赴苏而结束,行前交待与孟氏的联系暂由黄领事代行。孙科到莫斯科后,考虑到向法求援两案均与军事有关,于是电告蒋介石,建议由当时在莫斯科的驻苏大使杨杰继续与法方商谈。杨杰到巴黎后立即与孟戴尔会晤。

孟氏向杨杰介绍了5名军官,其中陆军中将1名,陆、空军上校各1名,中校1名。杨杰亲自接见考核后决定聘用。此5人中有4人为现役军人,在办理了假退役手续后很快就启程赴中国应聘。

关于战略物资假道安南一案,双方按事先商定,先订立了密约。密约内容大致为:法方同意中国的战略物资利用海防至河内以及河内至昆明的铁路运到中国境内,运费由中方负担。双方商订后,杨杰呈报蒋介石,自请以中国军方代表身份签字。南京接到电报后,为慎重起见即向外交部询问,外交部又电询驻法的顾维钧大使。因孙科与达氏、孟氏的会见均绕过大使馆,且杨杰到巴黎后也未曾拜会顾,军事顾问已启程赴华等,顾一无所知。于是顾回电称密约绝无其事。这样一来,密约

之事曝光,亦无法保密。顾大使对孙科、杨杰的所作所为亦有些不满。不久,在欧洲法德战争爆发,法国无暇东顾,密约之事就此搁浅,军事顾问亦因法国国内发布动员令被征召回国。

抗战初期,中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孤军与日本作战,迫切需要得到充分的军需物资和实际援助以抵抗侵略者。孙科根据中国抗战时期外交政策“多求国际友谊合作之方针”,数度赴法,多方奔走。为寻求突破,甚至不怕得罪大使馆,用心良苦。孙科采用此种方式是必要的。因为法国内阁在外交政策方面存在分歧,法外交部认为欧洲问题重于一切,所有对远东问题的考虑必须服从外交部这一工作重点。因此,把与援助中国有关的事情尽可能地对法外交部保密应为可取的做法。